

□ 闻聘

破解《诗经》成书迷雾

《诗经》三百零五篇，收录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五百余年诗歌，跨越千里地域，汇集众手而成。这部穿越近三千年岁月依然熠熠生辉的经典，究竟如何诞生？长期以来，“孔子删诗”之说深入人心，《诗经八堂课》指出，孔子并非删诗者，而是整理者、传播者与教化者。

《左传》有明确记载，吴国公子季札赴鲁观赏周乐，乐工依次演奏十五国风、二雅、三颂，篇目次序与今本《诗经》大体一致，而彼时孔子年仅八岁，尚在幼年，根本不可能主持删诗。此外，孔子早年教学便已称“《诗》三百”，足见三百篇的规模在孔子之前早已固定成型。孔子的真正贡献，在于对《诗经》进行了系统的音乐整理，“皆弦歌之，以求合《韶》《武》《雅》《颂》之音”，让诗篇回归礼乐正声；同时将《诗经》作为教育弟子的基础教材。

《诗经八堂课》认为，促成《诗经》成书并流传至今的，是周代一整套成熟、严谨的官方文化制度。周天子为了“观风俗，知得失，自考正”，专门设立采诗之官，于孟春时节振木铎于路，行走四方采集民间歌谣，将百姓的喜悦哀乐、生活疾苦，社会风气汇集于王室。与此同时，各国诸侯与朝臣有“献诗”之制，公卿列士赋诗讽谏、颂美时政，为王室提供参考。

在此基础上，各国乐官太师承担起搜集、筛选、修订本地诗歌的职责，再将整理稿上呈周王室，由王室太师统一雅化语言，厘定韵律节奏，规范篇章体例，最终形成语言统一、章法齐整、音韵和谐的官方定本。这一过程决定了《诗经》并非原生态的民间歌谣，而是经过官方系统整理、承载礼乐功能、服务政治教化的经典文本。也正因如此，今本《诗经》才能呈现出高度统一的语言风格、韵律习惯与章法结构。

《诗经八堂课》指出，《诗经》的作者群体远比一般认知更为多元。全书仅有五篇明确标注作者，均为西周贵族朝臣，其诗作为多为政治讽喻与颂美之作。十五《国风》的作者以城市贵族、士人、平民为主。《大雅》《小雅》与《三颂》则多出自公卿列士之手，用于朝会、宴饮、祭祀、讽谏，是典型的贵族文学。

汉代之后，《诗经》之学分为四家：齐、鲁、韩三家为今文诗学，西汉时期立于学官，盛极一时，魏晋之后逐渐散佚；毛诗为古文诗学，由毛亨、毛萁传授，东汉郑玄为之作笺后大行于世，最终独传至今。我们今日所读《诗经》，正是毛诗系统。这一流传脉络，不仅是文献的演变，亦是经典阐释的历史轨迹。

礼乐文明的精神底色

诗乐合一，是《诗经》本真的存在形态，也是其区别于后世所有诗集的重要特征。《诗经》本是乐舞唱词，诗、乐、舞三位一体，并非独立的文学文本。在周代，风、雅、颂的区别，首先是音乐之别：国风配以地方俗乐，活泼灵动，贴近世俗；雅乐采用王畿正声，典雅庄重，合乎礼制；颂乐专用于宗庙祭祀，节奏迟缓，气象肃穆。

周代乐器品类繁多，金石、竹



纪录片《嘿，这就是诗经》剧照

于古老诗行 寻风雅中国

一部《诗经》，三千年诗骚源头，三百篇风雅根脉。它被奉为儒家六经之首，是古代学子的启蒙课本，也是中国人情感与审美的最初坐标。然而在现代学科划分里，它常被窄化为一部单纯的文学作品集，礼乐教化之旨、社会实录之实、文明基因之重，多被轻描淡写。黑龙江大学刘冬颖教授所著《诗经八堂课》，以八堂深入浅出的通识课，试图还原《诗经》的本来面目：它不只是诗集，更是周代社会的百科全书，礼乐文明的核心载体、中华“风雅精神”的源头活水。

木、皮革、土石皆可入乐。其中，钟鼓等金石之声构成雅乐的主体，音色庄重、节奏规整，契合王室祭祀、朝会、宴饮的礼仪氛围。琴瑟等丝竹乐器音色婉转、表现力强，后来成为“新声”的核心，更贴近民间情感表达。《诗经》中大量描写乐器、乐舞的诗句，正是当时诗乐一体、礼乐相融的真实写照。

《诗经八堂课》认为，礼乐文明塑造了《诗经》“乐而不淫，哀而不伤”的中和之美。这种美，不是无节制的情感宣泄，而是节制有度、合乎礼义的表达，欢乐而不放纵，哀怨而不颓丧，愤怒而不暴戾，思念而不失分寸。这种审美品格贯穿全书，构成儒家“温柔敦厚”的诗教内核。

西周末年，王室衰微，诸侯崛起，一场“礼崩乐坏”的社会巨变，

改变了《诗经》的命运。传统雅乐日渐衰落，郑卫之音等世俗“新声”兴起，以丝竹管弦为器，情感直白、节奏灵动，更贴近民间生活与真实情感。自此，《诗经》逐渐脱离音乐的羁绊，从乐舞唱词转变为纯粹的文本经典，“赋诗言志”成为春秋时期外交、社交、政治场合的通行方式，音乐属性日渐隐没，文辞义理成为解读的中心。

在《诗经八堂课》看来，“风雅精神”是《诗经》的灵魂。这一精神，以孔子“思无邪”为底色，以现实主义为内核，以美刺讽喻为功用，以温柔敦厚为气质。

风雅精神，首先是直面现实的精神。《诗经》不回避疾苦，不粉饰太平，书写劳动的艰辛、爱情的悲欢、征战的苦难、徭役的沉重、政治的得失，将社会百态、人间万

象尽收笔端，形成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。从汉乐府“缘事而发”，到杜甫“诗史”，再到白居易新乐府运动，无不承续这一精神血脉。

风雅精神，也是美刺兼具的道德担当。“美”即颂美良政善德、美好人事，“刺”即讽谏弊政丑恶、社会不公，以文学干预现实、以文心承载道义，彰显文人良知与社会责任。这种精神，让《诗经》超越了单纯的抒情，成为承载社会理想、推动社会改良的文化力量。

风雅精神，还是真诚纯粹的情感底色。孔子以“思无邪”概括《诗经》，强调其情感发自本心、真挚无伪，无论是爱恋的热烈、思念的深切、怨愤的尖锐，还是祝福的诚恳，都无矫揉造作之态，无虚浮夸夸之词。这种真诚，让三千年后的读者依然能与古人心灵相通、情感共鸣。

风雅精神，最终升华为温柔敦厚的文化品格。情感表达含蓄有度，怨而不怒，刺而不激，以温和的方式传递教化，以含蓄的语言承载道义，塑造了中国人内敛、温和、包容、敦厚的精神气质。“风雅”二字，也从诗学概念，一步步升华为君子的气质风度、社会的文明风尚。

周代生活的百科全书

在《诗经八堂课》看来，《诗经》是一部活态的周代社会百科全书，全方位、多角度、立体化记录了当时的农业生产、经济生活、婚恋习俗、战争徭役、地域文化。

农业是周人立国之本，是《诗经》最重要的书写主题之一。《诗经》中的农事诗，详尽记录了西周至春秋时期成熟的农业文明。从

中可知，大规模耦耕制度普遍推行，金属农具逐渐普及，黍、稻、麦、菽、麻等主要农作物一应俱全，物候气象知识成熟完备，除草、治虫、灌溉等精耕细作技术广泛应用。《豳风·七月》以时令为线索，逐月描绘全年农事劳作与百姓生活，从春耕、夏耘、秋收、冬藏，到衣食住行、祭祀宴饮，堪称上古农业社会的实录。

经济生活在《诗经》中亦有清晰鲜活的呈现。“抱布贸丝”记录了早期民间物物交换的场景，贝与铜成为早期流通货币，商业交换逐渐渗透社会生活。“周道如砥，其直如矢”展现了周代发达的陆路交通，舟船往来便利了水路运输与商贸交流。城市中兴起固定的市场与商业区，东门成为商业聚集与社交往来的中心，手工业与商业的繁荣，推动着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。

婚恋诗是《诗经》中最动人、最广为流传的篇章，近九十首作品，还原出一个鲜活、自由、守礼又重情的情感世界。周代婚恋观念相对开放，青年男女可在春游集会时自由相会、互赠礼物、大胆追求爱情。比如《溱洧》中男女相悦、嬉笑游玩的场景，充满青春气息与生命活力。婚嫁礼仪遵循纳采、问名、纳吉、纳征、请期、亲迎“六礼”，讲究媒妁之言、父母之命，同时坚持“同姓不婚”的古老传统，兼顾情感真挚与礼制规范。

《关雎》《桃夭》《木瓜》《子衿》等千古名篇，写尽爱恋的美好，相思的缠绵，婚嫁的喜悦、祝福的诚恳。诗中的女性形象独立鲜活、敢爱敢恨、忠贞坚韧，打破了后世对古代女性柔弱顺从的刻板印象。“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”是中国人的婚姻誓言。“投我以木桃，报之以琼瑶”成为中国人待人处世、情感交往的永恒准则。家庭和睦、夫妻和美、敬老爱幼，构成了周代朴素的家庭理想，也是中国人延续至今的生活理想。

战争与徭役诗共三十余篇，呈现出复杂、理性、充满人文关怀的战争观。《诗经》中既有歌颂征伐、维护王权统一的庙堂之诗，也有同仇敌忾、共御外侮的爱国之诗，更有大量书写征夫之苦、思乡之痛、厌战之情的诗篇。《东山》《采芣》《击鼓》均以普通士兵的视角，写尽征战的艰辛、家园的思念、人生的无奈与离别的痛苦。这些诗歌不崇尚穷兵黩武，而重视民生疾苦、思念家园、追求安定和平，彰显了深沉的人文关怀。

《国风》更是十五种地域文化的生动呈现。周南、召南雅正平和，是文王教化的典范，居国风之首。邶、鄘、卫三风地处殷商故地，遗风浓厚，情感浓烈，婚恋自由。郑风地处中原商业枢纽，民风开放，情感率真，情诗大胆活泼。秦风居西北边陲，民风尚武豪迈，气势雄浑。王风、桧风、曹风则因王室衰微、小国危亡，多乱世悲叹与亡国之思。《国风》保存了先秦时期多元丰富的地域文化，成为研究先秦历史、地理、民俗的珍贵史料。

正因为如此，《诗经八堂课》指出，“不学《诗》，无以言”，不是夸张之语，而是时代共识。《诗经》以周代通用雅言写定，成为跨地域的语言范本，打破方言隔阂，推动文化认同。它所承载的礼乐精神、人伦秩序、家国情怀、审美范式，塑造了中国人的精神品格与文学面貌，是中华文明不可替代的源头经典。

【相关阅读】



《诗经八堂课》
刘冬颖 著
中华书局



《诗经别裁》
扬之水 著
中华书局



《讲给大家的诗经》
李山 著
东方出版社